

doi:10.13582/j.cnki.1674-5884.2020.05.024

顺从文化的表征:职业高中生 网络空间中的自我呈现

赵彬

(北京师范大学 教育学部,北京 100875)

摘要:本研究以某职业高中生建立的QQ群组为个案,运用网络民族志的方法探究职业高中生在网络空间中的自我呈现,从而揭示该群体的文化特质及生成机制。分析结果表明:污名的承受者、消极情感的体验者、学历的渴望者以及顺从文化的践行者是职业高中生自我呈现的方式,四种角色作为教育制度驯化的结果连接了自我与文化,并表现出顺从的群体特质。研究发现:作为顺从文化的表征,职业高中生网络空间中自我呈现的作用根基是现实的教育制度;对自我的二重区分表明制度作为“铁笼”压制了个体的能动性,使其行动表现出强烈的路径依赖;遵从制度价值和规范形成的顺从文化是制度化的结果,导致了强化已有制度的合法性并裹挟于其中无法抽离的副作用后果。此种顺从文化亦能推动对教育制度与职业教育作用的再反思。

关键词:职业高中生;自我呈现;网络民族志;教育制度

中图分类号:G7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5884(2020)05-0150-07

1 问题的提出

社会的原子化发展使社会成员之间缺乏有效互动,导致弱势群体对弱势群体的专制无处不在^[1],而网络技术的发展使弱势群体能够借助互联网平台寻求鼓励和慰藉^[2]。职业高中生在中国传统文化语境中经受污名而处于边缘地位^[3],缺乏话语权力并被他人言说,网络空间使原本缄默的职业高中生聚集在一起呈现与言说自我。网络空间是日常生活实践的重要构成,能够生成和重塑文化并形成多样的社会文化现象,身处其中的职业高中生作为意识社群,表现出的共享符号是群体文化的曲折表征,因此他们在虚拟世界中的自我呈现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诠释群体文化,但国内学者对这一现象的关注略显不足。

针对职业高中生的相关研究包括应然层面的理论探讨,如改善职业高中的课程与教学以及提升职业高中生的职业能力^[4-5],也有大量经验研究以提升职业高中生的身体和心理健康为目

的^[6-7]。尽管上述研究涉及职业高中生的相关问题,但多基于现实环境而非网络空间,多从客位视角出发,忽视了该群体具备的能动性及其对外部世界的主观意义建构。因此,本研究基于职业高中生网络空间中的自我呈现揭示该群体文化的特点及生成机制,旨在丰富学理层面的讨论并增加对现实生活的关切。

2 对已有研究的反思

自我呈现由欧文·戈夫曼(Erving Goffman)提出,意为互动过程中个体旨在影响他人印象的人际行为,包括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方面是指个体有意操控行为以影响他人印象的形成,从而塑造自身期望的角色和身份^[8];另一方面则为实现互动的基本条件,有助于个体获得情境定义并维持互动^[9],这一过程并非时刻涉及个体有意的欺骗行为,而是行为在不同情境中的自然流露,甚至可能威胁个体以期呈现的理想自我^[10],二者的差异

收稿日期:20191106

作者简介:赵彬(1992-),女,河北清苑人,博士生,主要从事教育社会学研究。

表现为个体在互动过程中的外显行为是否受有意的策略意图控制。大量研究沿用第一层含义将自我呈现等同于个体有意操控行为以进行管理印象,而网络空间为整饰自我提供了潜在可能^[11],其开放性和匿名性便于个体进行策略性的自我呈现,因此相关研究逐步从现实世界转向网络空间,主要集中于社会心理学^[12-13]和传播学领域^[14-15],多关注个体的行为与动机、分析个体如何进行形象塑造和身份建构以及此过程中遭遇的自我认同的矛盾和风险^[16],或运用量化和实验的方法测量自我呈现的成因、特点、策略及影响因素^[17]。

尽管上述研究为理解职业高中生网络空间中的自我呈现提供了基础性框架,但关注的角度多为操控性的自我呈现,完全将自我呈现凝练为个体意图的展现,并且仅停留在虚拟世界,缺乏与现实社会的有力勾连。换言之,只注重个体的能动性,对行动背后现实的结构性与制度性因素缺乏考察^[18]。事实上,戈夫曼拟剧论的分析对象包括作为表演者的自我和作为展演角色的自我,二者同时涉及外在情境与结构的限制以及个体的主动性与能动作用^[19]。因此拟剧论的关键,不是对日常生活中剧场戏剧诸面向的关注,而是借助自我来分析由互动产生的实体结构^[20],即从自我这一微观视角出发寻求相对宏观的作用力和解释力。有鉴于此,针对关键概念“自我呈现”的研究,不能只关注作为表演者的自我并分析个体的行为动机,而应当对作为展演角色的自我加以考量并分析个体行动的意义与限制性条件。因此,职业高中生在网络空间中如何阐释对外部世界的意义理解以及面临的个体与社会之间的张力仍需要进一步挖掘,如何联系个体能动性与社会的制约因素则是本研究关注的重点。另外,已有研究过分依赖拟剧论的相关概念,诸如“前台”“后台”“表达的维持与控制”等频繁出现在讨论中,但放置于中国的语境中,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本土文化。所以本研究关注情境化的自我,但避免着重分析个人的动机和意图,转而试图与现实世界进行勾连,弥补制度与结构探讨的不足,从而实现本土化的理论积累。

3 研究方法

互联网不仅是科技发展的产物,也是研究田

野与质性资料收集的途径和工具。传统的研究方法对网络空间的考察力度有限,“网络民族志是基于线上田野工作的参与观察研究。它使用计算机中介的传播作为资料的来源,以获得民族志对文化或社区现象的理解和描述”^[21],该方法的出现为理解兴盛的互联网及其衍生的文化现象提供了可能。因此,采用网络民族志对职业高中生网络空间中的自我呈现加以研究,能够有效回应本研究的问题并揭示出该群体的文化特质。同时,网络民族志具备自身优势,其自然主义技术能够使研究在完全不引人注意的情况下展开,其匿名性使职业高中生在其中的自我呈现具备更高的自由度,易于访问的特性便于研究者亲近其文化并生成共情式的理解。此外,互联网技术能够有效且近乎完整地存储在线互动的相关内容,利于资料的进一步处理和分析。

网络民族志与传统民族志的研究步骤一致,二者的差异主要集中为研究对象的不同,前者为线上社区,后者则是现实世界中的社区。线上社区是指会进行公共讨论的介于宏观和微观之间具备一定数量的社会群体^[22]。QQ群的群聊功能方便多人同时在线交流,其较强的互动性能够反映群组的群体特征。“Be yourself”是由来自全国各地的职业高中生共同建立的一个标记为兴趣爱好的QQ群组,建立于2017年9月。自研究开始至结束,群组成员数量基本稳定在200人左右。经过该QQ群组的群主同意,研究者进入该群并进行了长达8个月的参与式观察,从而对其中来自不同省份、不同学习专业以及不同性别的职业高中生群体的自我呈现加以了解。在QQ群中,成员通过分享自身的学习和生活进行互动与交流,因此对群成员交流的内容,包括文字、图片、表情包等进行记录和分析。另外,诸多社交平台有与职业高中生相关的互动话题,其中作为主体对象的职业高中生自身参与程度较高,也为本研究提供了辅助性资料。

4 研究结果

通过分析职业高中生在QQ群组中的自我呈现发现,他们在互动过程中传达出四种角色:污名的承受者、消极情感的体验者、学历的渴望者以及顺从文化的践行者。上述四种角色一方面蕴含对现实的无奈和不满,职业高中生在现实中饱受污

名,而网络空间恰恰为该群体提供了宣泄情感的平台;另一方面,职业高中生洞察到学历的局限性,寄希望于自身努力并期待通过多种途径接受更高层次的教育,试图摆脱职业高中生的身份和命运。事实上,四种角色作为教育制度驯化的结果贯穿其日常生活实践,表征着该群体文化的顺从特质。

4.1 污名的承受者

制度具备社会整合的功能,通过压制越轨实现社会控制。教育制度作为社会评价的参照规范,界定评价内容并生成评价规则,个体一旦偏离要求则会被贴上越轨者的标签。无论是制度本身还是制度内容,都需要依赖组织的运行,因此,学校这一实体组织发挥了重要作用。压制越轨包括正式与非正式两种途径^[23]。与普通高中相比,人们对职业高中生充满了负面的刻板印象,譬如打架斗殴、不学无术等。类似于封建时代的继承头衔,个人获得的教育是一种身份象征。教育制度作为一种社会制度,是极具权威的分类机制,因此职业高中不只是中等职业教育体系的组成部分,而带有更为深刻的社会意涵赋予个体社会角色。群内的职业高中生初中毕业后,在升学评价机制的作用下进入职业高中并获得职业高中生的身份,经正式控制而遭受污名,“职高嘛,文盲进流氓出”(176xxxx399)。主流文化的价值规则和判断将进入职业高中定义为越轨行为,通过污名化的方式实施控制的同时强化了已有的价值评判标准。非正式的控制延伸至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尤其体现在与其他群体的交往过程中需要时刻注意他人对职业高中生这一身份的社会性识别,乐于助人或者去医院看病都需要谨小慎微避免身份的暴露,“医生一听我读职高完全变了脸”(243xxxx271)。亦如戈夫曼笔下的精神病院,全控机构产生的影响不局限于单一的物理空间场域,却能够产生普遍意义上的压制^[24],学校作为制度性存在能使个体获得相应的社会经验和特定角色以实现社会化,但同时对于职高生的角色定义成为整个社会共有的缄默认知并被广为接受。这些共同的理解和象征符号嵌入基础的社会框架之中,导致职业高中生在与其他群体日常互动的过程中处于被强势群体控制的边缘地位。

4.2 消极情感的体验者

“由于学校立基在个人化、专门化、相互依赖

的社会角色的整合之上,所以社会控制诉诸于个人内心的羞耻感”^[25],因此学校基于道德生活体系建构的表意性秩序会触发个体情感。职业高中生认同教育制度的权威,会基于制度作用的结果衡量自身与他人,并在情感上做出趋同性的反应。他们与进入普通高中的同龄人比较后,发现职业高中生的身份并未达到外界评价标准,不符合主流的规范预期与文化价值,所以形成了矛盾复杂的情绪,认为“读职高背负罪恶感”(345xxxx3261)。

情感上的消极体验类似一种惩罚机制能够对个体的行为产生引导作用,因此职业高中生抵触这一身份并试图降低其显著性。义务教育阶段结束后的第一次分流使步入职业高中的学生成了失败者并产生强烈的自卑感与羞耻感,他们可能会通过切断原有社交关系的方式弱化这一身份,“不和原来的好朋友联系了,我说不出口我上的学校”(345xxxx3261)。但有趣的是,QQ群中会不时出现将职业高中与普通高中对立的话语,他们通过贬损普通高中的方式实现共谋以表达情绪上的不满,但此种做法却又在网络空间中强化了他们职业高中生的身份。在主流文化与教育制度的共同作用下,即使职业高中与普高同属中等教育,但文化资源的差异决定了不同群体之间的层级关系,即职业高中生与普通高中生的地位在价值规范中出现了纵向的秩序分化。事实上,消极的情感体验看似是对职业高中生身份的对抗,实则是对差异化意识社群的回应。

4.3 学历的渴望者

在现代社会中,分工精细化程度的提升要求教育对个体进行基于理性和专业化的分类培养,职业高中恰能满足特定职业阶层对相应人才的需要,因此教育制度的运行与社会分工的逻辑相一致。QQ群组成员经常讨论职业高中毕业之后的规划,他们非常清楚毕业之后面临的严酷社会现实,商业或服务员工以及产业工人是较为可能的职业选择,如流水线工人或者“包工头”。

2019-01-13 21:55:02 (249XXXX504)

我们最多也只是包工头

2019-01-13 21:55:24 (176XXXX363)

包工头不是挺赚

2019-01-13 21:55:36 (249XXXX504)

但是累啊

2019-01-13 21:56:06 (249XXXX504)

大夏天的必须得站到太阳底下

……

2019-01-20 23:14:07 (326XXXX594)

一天工作12个小时

2019-01-20 23:14:14 (292XXXX235)

多半进厂

2019-01-20 23:14:44 (86XXXX561)

这些过去都是干最苦的活,干一两年还把你辞退了

……

QQ群中的职业高中生意识到,文凭作为制度化的文化资本形成了不同群体之间的层级关系,他们认为“大专的文凭还是没有竞争力”(181XXXX275),只有获得本科学历才能够改变不利境地,“多学点,考个不错大学,不要太早进社会,学历低,很累的”(248xxxx2441)。因评价体系 and 升学制度几乎无缘全国统一高考的职业高中生,早已被排挤在竞争性流动体系之外。尽管如此,即使面临职业高中师资和生源质量欠佳的限制,Be yourself群组的成员经常在QQ群里交流各种学习方法,相互鼓励参加技能大赛,或者相互推荐提供升学考试等相关服务的教育机构,力图为提升学历增加筹码。他们洞察了职业分层的原因,清楚文凭的筛选机制将会使其处于职业结构的底层,因此表现出对教育制度的强烈依附,渴望通过进一步接受教育并获得更高的文凭来突破现状。

4.4 顺从文化的践行者

培育顺从文化是教育制度的另一功效。制度具备规范的社会功能,为个体的行动提供导向,同时规范系统如一套奖惩系统,其中的规则表明何种行动选择有益,何种行动会受到惩罚。首先,顺从文化的逻辑为个体行动者提供外在的意义参照。在进入职业高中之前,成绩以及获得好成绩的能力作为一种特殊的控制形式发挥作用,从而判断学生是否服从教育^[26],职业高中生的行动逻辑与学校教育对个体的规范性期望相悖,因此进入了职业高中,“我初中就是懒、不努力,成绩差,所以就沦落到职高了”(294xxxx761)。其次,自我发展的路径具备内在参照性^[27]。QQ群组的成员进入职业高中后,通过日常生活实践洞察到学历是社会分工的基础,并认识到职高学历对未来生

活的局限,因此在对现实进行反身性思考后表现出对文凭的认同以及提升学历的强烈渴望。学校培育的顺从文化使职业高中生认为具备与教育制度和文化规范相一致的品质就能接受更高的地位教育而非生存教育,所以他们认为个人努力是摆脱污名与改变未来人生轨迹的重要途径,并进行了重构自我的尝试:

命运是真正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的,愿不愿意去努力改变也只有你自己能决定。(238xxxx438)

以前我特别喜欢偷懒,喜欢享乐,我现在觉得自己的改变很大。(135xxxx808)

……

职业分层是社会整合的途径,但职业角色并非受之于天命,职业高中生认为通过努力和奋斗提升个人的文化资源则可能改变未来的职业角色。学历的高低能够将社会范畴的分类自然化,即接受的教育与分工从事的工作直接相关,因此职业高中生的思维习惯早在学校中得以形塑,努力奋斗和认可教育制度的力量已成为集体意识的一部分。

职业高中生在与其他群体的日常互动中需要小心进行印象管理,避免制度化身份的暴露。他们表达自身羞愧或愤怒的情感则是对层级化的意识社群,即制度作用结果的自然回应。尽管职业高中生这一制度化的身份使其遭受污名,但他们信仰制度的作用,认可勤勉的品质并付诸实践,期望通过对制度的顺从获得更高的学历从而摆脱困境。因此,四种角色是职业高中生在网络空间的自我呈现,却是现实教育制度驯化的结果,表征着该群体顺从的文化特质。

5 讨论与分析

职业高中生在网络空间中的自我呈现依赖文字、表情符号等互动,通过此种方式生成共享意义并扮演相应的角色。角色是自我与文化之间的联结^[28],因此职业高中生在其中的自我呈现是该群体顺从文化的一种表征。值得注意的是,网络空间中的情境定义作为职业高中生在其中互动与呈现自我的基础,与现实的教育制度紧密相连。面对制度的规范作用,个体的能动性受到限制从而表现出顺从,因此顺从文化是制度化的产物,同时此种特质作为行动的副作用后果强化了制度的合

法性,使其陷入顺从制度的闭环。

首先,顺从文化是基于制度对个体能动性二重区分的结果。戈夫曼的著作中充满了自我二重性的张力,拟剧论是对作为表演者的自我以及展演角色的自我的讨论,事实上,他借助微观的个体能动性揭示社会的制约因素,也隐含了对个体能动性的区分。职业高中生在网络空间中的自我呈现,体现了他们实施符合自己心意的决策能力,即在虚拟世界呈现污名化的现实遭遇,宣泄消极的情感体验,同时作为学历的渴望者与顺从文化的践行者也表明他们早已栖居于制度之中^[29]。从行动者实施行动的角度出发来看,职业高中生群体反身性思考的能力极强,他们会对污名化的经历以及教育制度的作用进行反思性监控,洞察到生存教育与地位教育的差异,借助能动性实现自我控制,通过践行顺从文化要求的品质重构自我,渴望改变自身在教育场域中的位置,因此这一群体具备极强的能动性(power of agency)。从结构与能动性关系角度出发,职业高中生群体反思过程中依赖的实践意识和话语意识均受制于外部的结构环境,个体的能动性(agentive power)极为有限。尽管职业高中生群体基于制度形成了一定认知,理解自身以及身处的社会环境并做出与其符合的社会行动与物质性实践,但制度的强大力量使其深陷其中并渴望获得更高的学历是对制度路径依赖的结果,此种看似理性的行为实际上是丧失自由的异化,转而成为制度的奴仆。理性化的制度“铁笼”使其成为污名的承受者,但他们却只能依赖于制度摆脱污名身份与所属的地位群体,因而群体文化呈现出顺从的特点。

其次,职业高中生群体的顺从文化是制度化的结果。戈夫曼重视作用于自我结构的情境和制度。对于职业高中生而言,他们在网络空间中的自我呈现更多源自现实情境,现实生活中与其他群体的互动经验使其在网络空间中诉说污名的经历或表达个体的情感体验,他们只能在社会框架极强的结构性和强制性中调节自身。同时,学校的社会作用包括培养与传递符合社会主流价值的文化,也包括筛选和分化使学生走向不同的工作岗位乃至遵循不同的人生轨迹。文化可以经由两种方式生产——日常互动本身的经验以及专业的文化生产组织^[26]。价值观与价值判断以及组织设置是构成制度的两个要素^[30],职业高中生在互

动过程中传递的四种角色源于与其他群体的互动经验以及学校组织的作用。前者受到教育制度评判价值的影响,其中包含的评价机制具备强效的控制作用;后者则是教育制度的实体组织设置,通过形成地位群体的方式实现学生的社会化与社会整合,所以教育制度作为社会共享的意义机制亦会产生范畴分类的控制效果,是影响职业高中生群体在网络空间自我呈现的根本原因。在某种程度上,这一群体自我呈现的社会行为受教育制度价值标准的影响逐步定型化,同时被制度制约,能够使个体认可顺从制度的合理性,也能够使个体的行为具有可预期性,因此其表征的顺从文化亦是制度化的结果^[31]。

最后,作为顺从文化的表征,职业高中生群体在网络空间中的自我呈现产生了副作用后果,即增强了制度的合法性机制与控制力量。合法性机制是指社会制度成为被人们广为接受的社会事实并具备强大的约束力,从而规范人们采取的行动^[32]。从行动论的维度来看,职业高中生群体作为学历的渴望者和顺从文化的践行者,其行动兼具目的理性与价值理性。教育制度的分层机制植根于个体的文化—认知系统,个体希望能够从中获得相应的利益或抵御一定的损失。他们希望借助升学考试制度进入本科来获得更高的学历,此种行为是对教育分配个体社会地位的理性回应,他们在一定程度上理解了教育制度运行的逻辑,因此采取实践理性的方式来实现个人认为具备价值的目标,在制度的洪流中抑或主动抑或被动向前。职业高中生认可教育制度的权威与作用价值,其合法性被他们广为接受并引导他们思维与行动,因此他们渴望获得更高的学历以归属相应的地位群体,并试图借助践行制度价值重构自我来实现此种目的。但正是职业高中生看似合乎理性的行动却产生了副作用后果,包括可预期性与非计划性两个面向^[33]。制度使职业高中生蒙受污名,也是形成当前与未来地位群体的根源,所以职业高中生自我呈现的一大特点是渴望进入本科并获得更高的学历且相信个人付出努力能够有所改变,他们十分渴望突破所处的境遇,但做出的行动却强化了已有的文化规范和制度价值。他们对教育制度的顺从和依附,是遵从制度场域中行动逻辑的结果,为制度赋予了更为合理的意义。即使增强对制度的依附性和合法性并不是他们计划

实现的结果,但行动的后果总是不断脱离最初发起者的控制范围,职业高中生裹挟于其中无法脱离并强化了制度的控制力量。

6 结语

本研究是一项网络民族志研究,但揭示的现象却不局限于虚拟世界。事实上,互联网在某种程度上具备镜像功能,能够反映现实社会中个体与结构之间的互动与张力并揭示现实社会中的制度逻辑。因此,职业高中生网络空间中的自我呈现是多重因素交织相互作用的结果,亦能勾连虚拟与现实社会、微观互动与宏观制度。由于反学校文化与阶级再生产的紧密联系,当前研究多关注我国青少年群体反学校文化的表现和成因以及在再生产过程中发挥的作用,却忽视了顺从文化现象的存在^[34]。通过深入职业高中生群体,关注其对教育制度的意义理解与建构,发现他们在网络空间中的自我呈现表征着该群体文化中的顺从特质。与威利斯笔下具有反学校文化特质的“小子们”相比,这些职业高中生很早就洞察了一切,明白教育制度对于形成地位群体的重要作用,因此表现出对制度的强烈依附与顺从,渴望从其中获益抑或抵御风险。此种顺从文化提醒我们应当进一步深思职业教育的社会价值以及如何使其在我国真正发挥培养人才的作用。

参考文献:

- [1] 田毅鹏,吕方.社会原子化:理论谱系及其问题表达[J].天津社会科学,2010(5):68-73.
- [2] MILLER D, SLATER D. The Internet: An Ethnographic Approach[M]. Oxford: Berg,2000.
- [3] “要不要与职高生混”谁说了算?[EB/OL].(2016-02-27)[2019-05-27].新华网. 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6-02/27/c_128755209.htm.
- [4] 周庆平,乔雪芬,杨云飞.谈新课程标准下职业高中数学课程改革[J].教育与职业,2005(18):58-59.
- [5] 刘卫珍,孙孟侠.职业高中英语教学改革的探讨[J].职业技术教育,2000(10):31-33.
- [6] 赵曼羽,闫翔宇,谭健霞,等.职高生性相关知识水平、观念和行为习惯影响因素分析[J].现代预防医学,2017(14):2589-2592.
- [7] 苗建华.职高生的心理障碍及消除方法[J].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10(24):89-90.
- [8] SCHLENKER B R, WEIGOLD M F. Interpersonal Processes Involving Impression Regulation and Management [J]. 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 1992 (1): 133-168.
- [9] Tseñlon E. Self-presentation through Appearance: A Manipulative vs. a Dramaturgical Approach[J]. Symbolic Interaction, 1992 (4): 501-514.
- [10] TYLER J M. Triggering Self-Presentation Efforts Outside of People's Conscious Awareness[J].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2012(5): 619-627.
- [11] PAPACHARISSI Z. The presentation of self in virtual life: Characteristics of personal home pages[J]. Journalism & Mass Communication Quarterly, 2002 (3): 643-660.
- [12] BAZAROVA N N, TAFT J G, CHOI Y H, et al. Managing impressions and relationships on Facebook: Self-presentational and relational concerns revealed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language style[J]. Journal of Language and Social Psychology, 2013 (2): 121-141.
- [13] CIALDINI R B, WOSINSKA W, DABUL A J, et al. When Social Role Salience Leads to Social Role Rejection: Modest Self-Presentation among Women and Men in Two Cultures[J].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1998 (5): 473-481.
- [14] 马忠君.虚拟社群中虚拟自我的建构与呈现[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1(6):139-141.
- [15] TOMA C L, HANCOCK J T. Looks and Lies: The Role of Physical Attractiveness in Online Dating Self-Presentation and Deception[J]. Communication Research, 2010 (3): 335-351.
- [16] 刘庆奇,孙晓军,周宗奎,等.社交网站中的自我呈现对青少年自我认同的影响:线上积极反馈的作用[J].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2015(6):1094-1097.
- [17] 陈浩,赖凯声,董颖红,等.社交网络(SNS)中的自我呈现及其影响因素[J].心理学探新,2013(6):541-553.
- [18] 安东尼·吉登斯.社会学方法的新规则:一种对解释社会学的建设性批判[M].田佑中,刘江涛,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 [19] 王晴锋.重返戈夫曼的拟剧论与自我分析——一种社会批判的路径[J].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5):33-38.
- [20] 欧文·戈夫曼.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M].冯钢,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 [21] 罗伯特·V·库兹奈特.如何研究网络人群和社区:网络民族志方法实践指导[M].叶韦明,译.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6.
- [22] 郭建斌,张薇.“民族志”与“网络民族志”:变与不变[J].南京社会科学,2017(5):95-102.

- [23] 欧文·戈夫曼. 污名——受损身份管理札记[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4.
- [24] GOFFMAN E. Asylums: Essays on the Social Situation of Mental Patients and Other Inmates[M]. Garden City: Anchor Books, 1961.
- [25] 王瑞贤. B. Bernstein: 符码与教育论述导论[c]//谭光鼎, 王丽云. 教育社会学: 人物与思想.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9.
- [26] 兰德尔·柯林斯. 文凭社会[M]. 刘冉, 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8.
- [27] 安东尼·吉登斯. 现代性与自我认同[M]. 夏璐, 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7.
- [28] 乔纳森·特纳. 社会学理论的结构: 第七版[M]. 邱泽奇, 张茂元, 译.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06.
- [29] CAMPBELL C. Distinguishing the Power of Agency from Agentive Power: A Note on Weber and the “Black Box” of Personal Agency[J]. Sociological Theory, 2009(4): 407-418.
- [30] 郑杭生. 社会学概论新修: 第四版[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3.
- [31] 徐祥运, 刘杰. 社会学概论[M]. 大连: 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 2005.
- [32] 周雪光. 组织社会学十讲[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3.
- [33] ZWART D F. Unintended but Not Unanticipated Consequences[J]. Theory and Society, 2015(3): 283-297.
- [34] 周潇. 反学校文化与阶级再生产: “小子”与“子弟”之比较[J]. 社会, 2011(5): 70-92.

Representation of Obedience Culture: Self-presentation in the Cyberspace of Vocational High School Students

ZHAO Bin

(Faculty of Education,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 China)

Abstract: Taking a QQ group set up by vocational high school students as an example, this paper explores their self-presentation via online-ethnography to disclose the features and mechanism of their virtual culture.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 ways of their self-presentation involve the bearers of stigma, the experiencers of passive emotions, the aspirers for higher education certification and the practitioners of obedience culture. These four roles, as the tractable results of education system, combine self and culture and show the group peculiarity of obedience. The study finds that the foundation for vocational high school students' virtual self-presentation is the education system in reality; the duality of self reflects the system, as an “iron cage”, suppresses their agency, which makes their action full of the character of path dependence; the obedience culture is the systematized consequences of value and norms of institution, which strengthens the legitimacy of the system and is difficult to pull themselves away. This obedience culture could also facilitate to rethink the function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in China.

Key words: vocational high school students; self-presentation; online-ethnography; education system

(责任校对 龙四清)